

◎王 勇 等著

中日

『書籍之路』研究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37.604
127

◎王 勇 等著

中日

『書籍之路』研究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/王勇等著. —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2003. 10

ISBN 7-5013-2161-2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图书-文化交流-文化史-中国、日本-古代-文集 IV. G25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8411 号

书名 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

著者 王勇 等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行 电话:(010)66126153 传真:(010)66174391

E-mail Btsfxb@publicf. nlc. gov. cn

Website www. nlcpress. 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

开本 850 × 1168(毫米) 1/32

印张 9.75

版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234(千字)

印数 1—1500

书号 ISBN 7-5013-2161-2/K · 682

定价 18.00 元

◎教育部人文社科“十五”规划项目

◎浙江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重点项目

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

· 序 论 ·

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

——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王 勇(1)

· 汉籍东传 ·

汉籍东渐的传说与史实

——从文化交流的视角考察汉籍在东亚的流播

..... 王 勇(15)

日中“书籍之路”与《玉烛宝典》 [日]石川三佐男(32)

入明僧策彦周良与中日“书籍之路” 陈小法(42)

林希逸“三子虞斋口义”与日本朱子学

..... [日]池田知久(62)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及其东传日本 葛继勇(107)

· 佚书回归 ·

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《杂抄》考释 王 勇(130)

吴越国海外求书缘起考 王 勇(146)

《五行大义》的东传与西归 吴 玲(172)

流入东瀛的俞曲园遗札 王宝平(184)

清代赴日考察官绅日本访书活动初探 吕顺长(202)

· 书籍环流 ·

近代日人中国访书记 钱婉约(217)

“和刻本”与“华刻本” 王 勇(238)

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日本 江 静(254)

从《梅花百咏》看日本、琉球、中国的交流

..... [日] 池田温(270)

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

——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为例 ... 刘岳兵(288)

后 记 王 勇(307)

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

——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

王 勇

众所周知，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，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（1833—1905）提出，他在1877年出版的《中国》一书中，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。继李希霍芬之后，赫尔曼、斯坦因等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勘察，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，使之成为世界上“最长、最古、最高”^①的东西交通路线。

19世纪末欧洲人倡导的这一艰深的专业术语，今天不仅已成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，而且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词汇。进入20世纪中期，好事者不断扩大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，除了传统的“沙漠丝绸之路”，认为还存在“草原丝绸之路”、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等等^②。

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赏，近年成为国际性热门话题^③。在中国，广州、泉州、宁波等地为了申报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世界文化遗产，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活动，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；在日本，古都奈良以“海上丝绸之路终点”自居，成立了“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纪念国际交流财团”、“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”，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。

笔者虽然多次参与筹划中日两国的相关学术活动，频繁往来于宁波与奈良之间，但疑窦也由此而生。尤其是多次观览享誉

“海上丝路博物馆”的日本正仓院之后，疑问逐渐变成确信，遂产生一股倡导“书籍之路”的强烈冲动。

一、“海上丝路博物馆”探秘

2001年10月，第53届“正仓院展”在奈良开幕，翌日传出一个令人惊愕的信息：展品《成唯识论》卷第四的卷末，发现“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”墨书文字。其时，我正在当地主持“往返丝绸之路的遣隋使、遣唐使”国际会议，即与几位同行前去核实，初步确认纪年墨书与经文出自同一人之手。

《成唯识论》10卷，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，从显庆四年（659）闰十月开译，同年十二月完成，其徒窥基（慈恩大师）担任笔受（记录）。“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”的墨书，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，按照一般程序，再经润文、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。

现藏正仓院的《成唯识论》卷第四，很可能是未经润文、缮写的窥基手稿，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。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人唐僧，道照（一作“道昭”）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，回国时玄奘“以所持舍利、经论咸授和尚”；道照回国后创建禅院，“此院多有经论，书迹楷好，并不错误，皆和尚之所将来者”^④。由此看来，这部《成唯识论》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，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^⑤。

正仓院被称为“海上丝路博物馆”，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。奈良时代（710—794）原是东大寺的校仓，日本天平胜宝八年（756），圣武太上天皇去世，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庋藏的“国家珍宝”600多件，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。这些皇室至宝多为遣隋唐使带回的中国文物（包括西域文物），如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《杂集》，光明皇太后临书《乐毅论》、《杜家立

成杂书要略》，王羲之、王献之的书法真迹，王羲之的书法摹本 20 卷等等。（《东大寺献物帐》）

正仓院宝物品种繁多，包含书籍、文具、礼器、佛具、玩具、服饰、食具、药物、武器等，虽然不乏丝绸制品（如服饰、佛具），但比起金银器、玻璃器、漆器等要逊色很多，而至宝中的至宝莫过于文献典籍。

正仓院究竟收藏多少文献典籍，笔者尚未做过精确统计，其数量当以万计。比如，皮藏佛教书籍的“圣语藏”，就有隋代写经 22 卷、唐代写经 221 卷、宋版 114 卷，总数达 4960 卷之多。前面提到的《成唯识论》卷第四，只是其中的一卷而已。

笔者前后 6 次参观“正仓院展”，匆匆浏览丝织品、陶瓷器、金银器后，总是伫立在书籍展台前面，时时陷入沉思：若论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巨大，对日本人心灵渗透之深远，究竟是色彩斑斓的丝绸残片，还是深奥难解的汉文典籍呢？

二、周作人的“优孟衣冠”论

20 世纪初（1906），周作人追随鲁迅留学日本，在东京住了 6 年后回国。30 年代中期（1936），他在北平寓所写了一篇随笔，题目叫《日本的衣食住》（收入《日本管窥》、《苦竹杂记》等），回忆当初在日本的感受：

我们在日本的感觉，一半是异域，一半却是古昔，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，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，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。^⑥

所谓“古昔”，作者解释即“中国古俗”，文中还介绍“夏穗卿、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，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

或某字体，常指点赞叹，谓犹存唐代遗风，非现今中国所有”，因此断言“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，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”。

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，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，尤其是去古都奈良、京都观光，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、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。在日本急遽西化^⑦的近代尚且如此，全盘模仿中国的古代则更不待言。

隋大业四年（608），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，“东至秦王国，其人同于华夏”（《隋书·倭国传》），表明7世纪初日本部分地区已经“华化”了。五代义楚著《释氏六帖》，说“徐福将五百童男、五百童女”到日本，“今人物一如长安”。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，由此化生出“慧思转世倭国王子”、“杨贵妃东渡日本”等等的传说^⑧。

如果上述诸例说的是“海上丝路”的景观，那么“沙漠丝路”又呈何种景状呢？兹引录唐代诗人王维的《渭城曲》（一作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）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^⑨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，堪称千古绝唱。友人元二将离咸阳（渭城），前往安西（唐安西都护府治所，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境）；王维为之饯行，再三劝酒，依依不舍。诗眼即在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一句，因为出了“阳关”^⑩，再也碰不到“故人”，面对的将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，所以读来便觉诗中涌动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情。

既然同为“丝绸之路”，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？一种解释认为：唐代日本频繁遣使来华，促成中国文化大量东传。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，由于大海阻隔，唐代约300年间，日本来华使团不过15批，平均20年才一次。相比之下，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，使团往来远较日本频繁。以大食为

例，从651年至798年遣使39次，平均3年一次，有时一年数至^⑩。

显然，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，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，携带什么而归。回头再看周作人的随笔，他说日本与中国相似，“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”。周作人巧用“优孟衣冠”的典故^⑪，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，超越了模仿皮毛的阶段，而将之化为血、化为肉、化为骨，因而中国文化是“健全地活在异域的”。

运往西方的丝绸，大抵只能做成“衣冠”，或供权贵炫耀，或为女士增艳，虽然可以暂时装点门面，毕竟无法影响其心灵。那么，不属“优孟衣冠”的日本，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呢？

三、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

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，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，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频发生。贞观五年（631），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，唐太宗“矜其道远，敕所司无令岁贡”，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（《旧唐书·倭国传》）^⑫。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，“自云路经地狱之门，亲见其上气色蓊郁，又闻呼叫锤锻之声，甚可畏惧也”（《唐会要》卷九十九《倭国》）^⑬。

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，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。比如说鉴真大师，5次东渡失败，途中死亡36人，280余人退出，最后仅24人抵达彼岸（《延历僧录》）。以此察之，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，必肩负着重大使命。

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与来自西域的使节不同，主要目的不在于购求丝绸。当西方人深信赛里斯人从树上采集羊毛编织丝绸时^⑭，日本人已学会“蚕桑缁绩”，生产“细纴、缣绵”，甚

至向中国出口倭锦、绛青缣、绵衣、帛布、异文杂锦等^⑩。

在唐代的中日史料中，我们没有找到遣唐使大量进口丝绸的记录，倒是发现遣唐使带来的贡品以丝绸为主，日本朝廷支付给使团成员的经费也全部是丝绸、布帛之类^⑪。既然遣唐使携带丝绸作为贡品和货币，他们远道而来意欲得到什么呢？其实，《旧唐书》（日本国传）已经给出答案：

开元初，又遣使来朝，因请儒士授经。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，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，题云“白龟元年调布”。人亦疑其伪。所得锡赆，尽市文籍，泛海而还。其偏使朝臣仲满，慕中国之风，因留不去，改姓名为朝衡，仕历左补阙、仪王友。衡留京师五十年，好书籍，放归乡，逗留不去。^⑫

日本使以“阔幅布”作为束修之礼，所得锡赆则“尽市文籍”，其“好书籍”如此。所谓“锡赆”当指钱币，而非实物^⑬。假设《新唐书》列为“西戎”的波斯、大食、拂菻等同年入朝，且也获锡赆的话，会不会“尽市文籍”而去呢？相信不会，来自“沙漠丝路”的使者，大概会满载丝绸西归。这就是东西使者之不同，他们从唐朝携归的物品，反映出各自的文明取向。

关于唐代中日关系，池田温教授概括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三个方面，指出“当时交易等经济关系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，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”^⑭。笔者以为，上述见解也适用于遣唐使之目的，“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”则可置换为“书籍”。

遣唐使源于遣隋使，两者在日本历史上首尾衔接，前后约400年。其间，日本使团肩负的具体使命并非一成不变，但购求

书籍一直是他们的主要任务，这从中日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。如《善邻国宝记》（卷上）引《经籍后传记》^①（原文双行夹注，改为括号内单行注）：

以小治田朝（今按推古天皇）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，始用历日。是时国家书籍未多，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，买求书籍，兼聘隋天子。^②

这是文献所载日本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求书使团^③，自此中日之间的书籍流通渠道开通，并在遣唐使时代得到进一步拓展。遣唐使官员的求书情况，除前述《旧唐书·倭国传》之外，据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，第二次遣唐使回国（654年）后，大使吉士长丹因“多得文书宝物”而获封户、晋位、赐姓，可见求书成果甚至会影响仕途。

四、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渠道

稽考《新唐书》（列传），李唐治世约300年间，遣使入唐通聘的国家50有余。通观唐朝与北狄、西戎乃至南蛮的交聘内容，多为征战、和亲、贸易之类，惟独东夷别具一格，包含了书籍的流通。《通典》（东夷上）云：“大抵东夷书文并同华夏。”^④这是书籍交流给东亚诸国带来的文明盛况。

东亚诸国遣使入唐求书，这在来自其他地区的遣唐使中实属罕见。白居易在编定《白氏文集》时提到：“集有五本……其日本、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抄者，不在此记。”《旧唐书·张荐传》盛称张鹭（文成）文章天下闻名：“新罗、日本东夷诸蕃，尤重其文，每遣使入朝，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。其才名远播如此。”^⑤由此可见，唐代著名文士的诗文虽云“远播海外”，其实

主要在东亚文化圈内向东传播，这恰好印证书籍之路的存在。在贯通中日两国的书籍之路上，遣唐使（特别是使团中的留学僧俗）无疑扮演了主角，他们有国家提供的购书经费，又受到唐朝的优待，比较容易完成求书使命。

比如留学僧玄昉，一次携归佛教经论 5000 余卷，约当唐代大藏经的总数^②；再如留学生吉备真备，归国时携带《唐礼》、《大衍历经》、《大衍历立成》、《乐书要略》等共计 150 余卷。此外，号称“入唐八家”的最澄、空海、常晓、圆行、圆仁、惠运、圆珍、宗睿，在中国求得数以千计的经卷，所编的《将来目录》传承至今^③。

遣唐使虽然扮演主角，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其他的配角。尤其是进入 9 世纪以后，中国、新罗乃至日本的商人活跃于东海，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出现多种渠道。兹举证如下：

（一）私人馈赠。翻检最澄、空海、圆仁、圆珍等入唐僧的传记，几乎都得到唐人馈赠的书籍。现存的一些佛教经疏的序跋，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。

如石山寺藏《遗教经》跋云：“唐清信弟子陈延昌，庄严此大乘经典，附日本国子监大学羽右满于彼流传。开元二十二年二月从京发记。”再如《肇论疏》（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本）卷上记云：“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乙亥闰十一月三十日，扬州大都督府白塔玄湜，勘教流传日本国大乘大德法师，使人发促，无暇写，聊附草本，多不如法，幸恕之。后睿师、源师还，更附好本耳。”上述唐人陈延昌、唐僧玄湜在遣唐使回国之际，为使佛教流传日本，均抄写经疏相赠。

（二）渡日唐人随身携带。唐人渡日人数不多，但影响颇大。以鉴真一行为例，随身携带佛教书籍数百卷，其中的天台章疏成为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的契机。天平七年（735）渡日的袁晋卿，因通《文选》、《尔雅》被任命为大学寮音博士，大概也

带去相关书籍。

在唐代的中日书籍交流中，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渡日唐人在日本撰写的书籍。随鉴真赴日的法进，主持东大寺戒坛院，著有《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》、《东大寺受戒方轨》、《沙弥经钞》、《注梵网经》等；随鉴真移住唐招提寺的思托，撰有《延历僧录》和《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》，前者是日本僧史之滥觞，后者成为淡海三船著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的蓝本。

（三）中国商船的载运。9世纪以后，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，他们的舶载品中包含书籍。如据《文德实录》记载，承和五年（838）藤原岳守在太宰府检校唐船货物，偶得“元白诗笔”^②，进献给天皇，因获升官晋级。

元庆五年（881）抵日的唐商张蒙，临行前受李达之托，将日本所缺的佛书120余卷载往日本，转送给曾经入唐求法的圆珍。李达本人也是一位商人，齐衡三年（856）与圆珍同船去过日本。

（四）新罗人和渤海人的传播。遣唐使时代虽然中日直通的书籍之路畅通，但中介新罗、渤海的间接渠道仍然发挥着作用。仅以渤海为例，天安二年（858）渤海使乌孝慎赴日，带去唐朝的新历书《宣明历》，日本朝廷奉若至宝，因废已经过时的《大衍历》和《五纪历》（均为唐历），施行渤海使传来的《宣明历》，这部唐历此后沿用约800年，其影响不可低估^③。

有唐一代，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？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，但日本贞观十七年（875）编撰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。该目录辑入典籍1579部17345卷，约当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（36708卷）的一半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（51852卷）的三分之一强。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（冷然院）化为灰烬之后编撰的残存书目，那么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。

五、书籍之路的文明涵义

“沙漠，驼队，西方，夕阳西下，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，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；大海，船队，东方，旭日东升，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，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。”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^⑨。但是，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，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。

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，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，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；然而，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，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。这些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，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，继而开花结果，生成参天大树。

丝绸与书籍的关系，有点类似于米粒和稻种。假如中国出产的大米，成千上万吨地输往西方，一时或许会掀起“中国米”热，但当大米被消费完之后，其影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，因为米粒无法再生米粒；假如中国出产的稻种，只要一颗掉入东方的土壤，如果有人去呵护，便会生根发芽，便会抽出稻穗，便会形成稻田，继而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，因为稻种具有再生自我的机能。

书籍也如稻种，一旦播撒在人之心田，就会生根发芽，继而开花结果，在精神世界营造出一片绿洲，直接影响人们创造文明的活动。近代以前，中日之间人员往来及物资流通受到自然条件的阻遏，但日本却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倘若隋唐以来，日本不是冒鲸波之险孜孜求索书籍，而是大量购买丝绸、陶瓷、漆器之类，那么最多也只是“优孟衣冠”而已。

笔者在探索中国典籍东传史的过程中，还发现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：清代以前日本人来华求书，往往每种只取一本，很少有带复本回国的。仔细想来，路途凶险，跨海不易，为了多带书

籍，求阙本、购新书乃是效率最高的方法。

众所周知，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人和书。日本由于自然环境限制，自古无法像新罗那样把大量学生送入中国的太学（日本人入太学者，仅阿倍仲麻吕一人），而且中国士大夫渡海传授者罕见其人（少数僧侣除外），因此通过书籍汲取大陆文化，遂为不得已之策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，比之人持续时间更长、涵盖空间更广。

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，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，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，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。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，经过传抄、翻刻而流布世间，再经阐释、翻译而深入人心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。

时下讨论日本文化的特点，强调其独创性者有之，突出其模仿性者亦有之。然而，从书籍之路的角度审视之，日本文化的创造模式往往介乎两者之间。比如假名文字，均从汉字的草书及略笔蜕化而来，多少留下模仿的痕迹；但是，假名并非为了描摹汉字、标记汉语而创制，只是借助汉字的部分形体以表述日本人的思维，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创意。再如汉诗，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吟咏了大量作品；清末俞樾所编《东瀛诗选》录诗 4800 首，这仅限于 17 世纪以后佳作（偶含古代作品），其总数之巨实无法估算，而这些数以万计的诗歌，只是借用汉诗的形式以歌咏日本人的心声，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模仿。

明治维新（1868 年）之前，“四书五经”之类是日本公私学塾的启蒙书籍。虽然大多数日本人不通汉语，但却可以读懂汉文书籍。他们通过阅读中国典籍，与中国人接受大致相近的熏陶，由此形成类似的道德观念、审美意识、行为规范、艺术情趣。他们的知识构造与心灵世界，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。那么，由心灵的发露而创造的文化，自然也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。